

《東華漢學》第 19 期；121-156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4 年 6 月

從五賢信仰到道統系譜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聖門傳道脈絡之
歷史考察^{*}

陳逢源^{**}

【摘要】

孟子建構堯、舜、禹、湯聖聖相承的歷史系譜，藉此申明個人懷抱，聖化史觀，成為後人援引之材料。「致君堯、舜上」是儒者無可迴避的責任，宋儒從功利回歸於心性，期許救贖陷溺人心，乃是熙寧變法之後，反省新學的結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為孔學之淵源，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等五賢為孔學之羽翼，從孟子承孔子之絕學，進而及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系譜的建構，朱熹融鑄前賢議論，回歸於聖門傳道思考，從結構安排、詮釋細節，乃至於傳承脈

* 本文原作「從五賢信仰到道統系譜——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聖門傳道脈絡之考察」，發表於 2013 年 10 月 29 日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之「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經修改後，補入《四書章句集注》詮釋內容，乃執行國科會計畫所獲致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為：NSC101-2410-H-004-107-MY2，計畫助理為王志瑋同學，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絡，細加推敲，巧妙詮釋，儒學情懷得以顯豁，聖人精神得以朗現，《四書章句集注》遂有深刻之義理內涵。檢覈宋儒題稱聖人系譜的轉變，足見「道統」出於歷代的積累，也是朱熹建構的成果。

關鍵字：宋學、朱熹、四書、道統、聖人系譜

一、前言

「道統」出於朱熹的表彰，弟子門人有清楚的認知¹，只是後人援取漸多，使用浮濫的結果，「道統」成為儒學當中最複雜的概念也是不爭的事實。²朱熹〈中庸章句序〉云：「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³朱熹援取聖人世系，建構聖聖相承線索，以《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⁴作為傳授內容，於是在前人習見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人系譜，補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之傳，從而確立四書經典地位。「朱熹」、「四書」、「道統」成為一體的概念，已無可疑，然而清代考據既興，戴震（1724-1777）於童子之齡，質疑朱子《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缺乏證據⁵，用意所在，剔除「道統」與「四書」關係；錢大昕（1728-1804）《十駕齋

¹ 宋·王柏，《魯齋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1186，卷 11，〈跋道統錄〉云：「『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頁 166。

²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臺北：文友書店，1972），卷 28，〈覆發示圖象第一笥子〉云：「皇上之膺道統，而衍心傳者，於是在矣。」頁 1424。清·李紱，〈榕村文集序〉云：「先生奉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為之序，推尊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頁 4。朱熹標舉「道統」，隱然有「道統」高於「治統」之意，然而李光地以「道統」表彰康熙，混淆「道統」與「治統」關係，原本高尚其志的自覺象徵，卻也不免淪為政治人物操縱的工具。

³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 14。

⁴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卷 4，〈大禹謨〉，頁 55。

⁵ 戴震十歲從學，就有敏銳之見識，雖然近乎軼事，但正代表清代乾嘉學者求實的學術精神。參見清·洪榜，〈戴先生行狀〉、清·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所載，清·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第七冊「附錄」，頁 4、30。

養新錄》云：「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⁶強調出處，思索重點，恐怕在於消解「道統」與「朱熹」關聯。然而與此相反，民國以來，嘗試以西方「哲學」重新建構學術脈絡，「道統」推究精微，成為理解傳統學術的重要概念。⁷前者消除「道統」論述基礎；後者擴張「道統」為傳統文化核心，兩者相互歧出，卻又同時存在於近人觀念當中，「道統」概念之複雜，由此可見。

事實上，「道統」必須回歸朱熹，也必須回歸宋代語境思考，以宋代儒學發展，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諸儒於事功、文學、義理之間，相互激盪，在追尋聖人的共同想望中，推動儒學復興運動，全祖望（1705-1755）以「學統四起」形容其盛況⁸，宋代學術之所以稱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代表一種學術的承繼起，牟宗三先生指出「新」乃是指其從先秦齊頭並列，並無一確定傳法統系，確定出一個統系，以決定儒家生命之基本方向，承繼先秦儒學開出新葉，所以為新；也是直接以孔子為標準，相對於漢人以傳經為儒之為新。⁹宋人在儒與佛，現世與彼世選擇當中，思索生命之究竟，其中還有相對以往，對於自身學術歷史定位的思考，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責任感，以及「同治天下」的主體意識¹⁰，激化慨然承擔之歷史情懷，牽涉萬端，遠比想像

⁶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冊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卷18，「道統」，頁492。

⁷ 葛兆光云：「這種孔、孟到韓愈，再由韓愈到程朱的『道統』式的歷史脈絡，經由宋儒的努力而漸漸成為近世中國士人的共識，也成了後來書寫哲學史或思想史的第一層基礎。」見〈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脈絡的來源與確立〉，《文史哲》第2006年第3期（總294期），頁49。

⁸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全祖望，〈宋元學案序錄〉，頁2。

⁹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第一部「綜論」，頁13。

¹⁰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第三章「『同治天下』——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有詳細的討論，分析宋代士人接受「權源在君」的事實，卻毫不遲疑地將「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的身上。頁312。

複雜，此乃宋代學術精彩之處，也是了解理學必須掌握的重點。然而不論是反省漢、唐學術，抑或是思考儒學的真諦，其中最核心問題，乃是回歸聖人的想望與追求。相應於此，朱熹（1130-1200）無疑是極為關鍵人物，而《四書章句集注》正是此一訴求下重構經典的重要成果。宋代諸儒既起，高舉旗幟，各標宗旨之際，朱熹揭示儒學方向，在天理人欲之間，樹立以道自承的典型，遂能從兩漢陰陽感應、魏晉玄學，乃至於隋唐佛學中，昂然奮起，證成孔孟學術地位，意義所在，得見朱熹為「問世之鉅儒」的地位。¹¹筆者歷檢正史載錄，分析歷來〈儒林〉與〈道學〉差異所在，撰成〈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以經典重構角度，檢討朱熹建構四書學成就與意義，¹²循此而進，分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有關孔門弟子的檢討，完成〈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¹³，用意所在，乃是探究朱熹對於聖人系譜的思考，然而回歸於宋代儒學復興的氛圍，了解其中發展脈絡，以及由孔門而及於道統之傳的思考，必須要有更為宏觀的觀察，因此進而歷檢《全宋文》材料，考察聖賢系譜題稱樣態，撮舉宋代諸儒論述情形，分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安排細節，期以顯豁「道統」歷史意涵，期以得見朱熹融鑄反省，志復聖道的思考，也可以了解宋代諸儒賡續而進的思想方向。

¹¹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48，〈晦翁學案上〉，頁 1505。

¹² 參見陳逢源，〈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41-45。

¹³ 參見陳逢源，〈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文與哲》第八期（2006.6），頁 279-310。

二、北宋儒學之傳的線索

韓愈（768-824）標舉儒學價值，對於凝聚儒者有以繼起之情懷，極具宣示作用，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後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¹⁴，「道」並非出於佛、老，而是原本文化所具有，聖聖相承，孟子之後雖然不傳，但儒學具有淵源，乃是無庸置疑之事。孟子（前372-前289）聖化史觀成為韓愈援引材料，建構儒者欣慕的永恆典型，召喚後人有以繼起的情懷，「斥異端」的主張，更成為韓愈排佛、老的依據，孟子保存儒學於微危之間，韓愈引為同道，千古遙契，兩相呼應。此後，由尊韓而尊孟，成為後繼者努力的方向，楊綰表彰《孟子》事見於《新唐書·選舉志》¹⁵，皮日休（834?-902）撰〈請孟子為學科書〉，收於文集當中¹⁶，尊孟成為儒者共同的訴求，日後風勢所趨，終於有從諸子「升格」過程¹⁷，清儒趙翼（1727-1814）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¹⁸乃是極為正確的觀察。韓愈與孟子成為一組詞彙，成為北宋士大夫經常舉列的人物，柳開（948-1001）自稱「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¹⁹，表彰孟子頗具名聲，文集中有〈續

¹⁴ 唐·韓愈撰，馬通伯校注，〈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卷1，頁10。

¹⁵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44，〈選舉志上〉，頁1166-1167。

¹⁶ 唐·皮日休撰，《文藪》，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3，卷9，〈請孟子為學科書〉，頁212-213。

¹⁷ 周予同，《群經概論》（高雄：復文書局，1986），頁112。

¹⁸ 清·趙翼，〈尊孟子〉，《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60），卷4，頁16。

¹⁹ 宋·柳開，《河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5，卷6，〈上符興州書〉，頁283。

師說》²⁰，並曾改名「肩愈」²¹，顯見柳開推崇孟子是循韓愈意見的結果，從而仿效其模式，建構孔子（前552-前479）、孟子、揚雄（前53-18）、韓愈相承的系譜，只是重點之間，可能與後人習知不同，〈昌黎集後序〉云：

聖人不以好廣於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於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尊於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於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於先生，聖人之經籍雖在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詠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於孟子與揚子雲遠矣。²²

分析其中說法，從「道」而及「文」，孟子、揚雄僅是亂世中「存聖人之道」，地位並不與韓愈齊等，可見韓愈在宋儒心中的崇高地位。

另外，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985-1039）出知兗州，於鄒縣四墓山找到孟子墓，去其榛莽，建成孟廟，以孔子子孫尋孟子之墓，崇祀孟廟，極具象徵意義，成為宋儒關注事件，從韓愈表彰之後，孔、孟有了進一步的聯結，激發北宋儒者諸多聖門傳道的想像，孫復（992-1057）〈兗州鄒縣建孟廟記〉言其始末，大力表彰孟子，云：

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洙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

²⁰ 宋·柳開，《河東集》，卷1，〈續師說有序〉，頁241-242。

²¹ 同前註，〈名系并序〉，頁240。

²² 同前註，卷11，〈昌黎集後序〉，頁318。

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諸謂此也。……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復學孔而希孟者也，……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²³

孫復特別留意孟子承繼孔子的歷史意義，孟子揭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揚雄繼之，韓愈承之，皆有其功，以其影響層面，存孔子之道於異端邪說之中，功不在禹下，「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無有過於孟子者，孟子遂能於諸儒之列超拔而出。孫復自承「學孔而希孟」，於北宋諸儒間，無疑具有引領的作用。依孫復〈上孔給事書〉載，孔道輔家廟中原就祀有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像，強調「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夫子者也」²⁴，陳鎬纂修《闕里誌》，收有孔道輔〈五賢堂記〉一文，云：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眾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為君，皋、夔、伊、呂之為臣，功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堙蔽，振之者無聞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殺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²⁵

五星、五嶽、五賢成為並列詞彙，人間正道由五賢維繫，由孔子而下，尋求儒者相傳線索，顯然醞釀已久，於是孟子、韓愈之外，又增列荀子

²³ 宋·孫復，《孫明復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0，〈兗州鄒縣建孟廟記〉，頁 174-175。

²⁴ 同前註，〈上孔給事書〉，頁 172-173。

²⁵ 明·陳鎬纂修，《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卷 18，〈五賢堂記〉，頁 937-941。

（前313-前238）、揚雄、王通（584-617）諸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為孔學之淵源，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為孔學的羽翼，以賢輔聖，以賢繼聖，儒學一脈相傳，孔子地位得以不墜，儒學得以傳承，來自於歷史上諸儒的表彰，五賢具有一種指標作用，更由於孔子後人崇敬尊祀的活動，吸引諸儒關注眼光，形成一種信仰，循此而觀，石介（1005-1045）《徂徠集》討論更多，列舉為例，如〈怪說中〉云：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²⁶

〈讀原道〉云：

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則吏部不為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²⁷

〈尊韓〉云：

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數百年，復有吏部。²⁸

石介以「三才九疇」、「五常之教」為儒學核心，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等五賢為儒者精神依歸之所在，儒者要有身膺其任的氣魄，時間流轉，不變的是儒者的信念與堅持，只是孟子與韓愈間，孰者為先，立場仍有游移。此一情形，隨著北宋政治改革遂有進一步發展，范仲淹（989-1052）〈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²⁹，乃是從《孟子·梁惠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³⁰轉化而來，慨然承

²⁶ 宋·石介，《徂徠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90，卷 5，〈怪說中〉，頁 216。

²⁷ 同前註，卷 7，〈讀原道〉，頁 226。

²⁸ 同前註，〈尊韓〉，頁 227。

²⁹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收入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89，卷 7，〈岳陽樓記〉，頁 623。

³⁰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 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216。

擔的氣魄，鼓舞儒者變革勇氣。歐陽脩（1007-1072）〈與張秀才棐第二書〉云：「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³¹觀察文集列舉孟子情況，已經逐漸脫離與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並列的模式，其中〈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一文更引石介之言「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³²石介以孟子來自我期許，聖賢相繼的五賢信仰中，諸儒開始思考儒學於現世當中的意義，尤其政治實踐的理想，吸引無數學人投身其中。北宋諸儒以孟子自許，王安石（1021-1086）乃是最為重要人物，〈奉酬永叔見贈〉標舉「道義」與「文學」³³，指出與歐陽脩不同的生命情調，重視韓愈的儒者被歸之於「文學」，至於儒學所重之「道義」，則另有不同的目標，所謂「能窺孟子」，「何敢望韓公」的期盼，在孟子、韓愈之間，王安石關注所及，乃是孟子以道自任的情懷，對於孟子傾慕，更勝於韓愈，比較其詩作〈孟子〉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³⁴，有意扭轉由韓及孟的路徑，王安石強化文化主體意識，以及政治實踐的想望，勇於承擔的氣魄，重視孟子更為明顯。孟子最終從荀子、王通、韓愈賢者相繼系譜中脫穎而出，新學新政議題，尊孟落實於政策當中，包括熙寧四年（1071）二月，《孟子》列入科舉。熙寧七年（1074）判國子監常秩（1019-1077）請立孟軻像於廟廷。元豐六年（1083）十月詔封孟子為「鄒國公」。元豐七年（1084）五月孟子配享孔廟。政和五年（1115）政府承認兗州鄒縣孟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等七人從祀。宣和年間（1119-1125）《孟子》刻入石經。³⁵尊孟活動於新黨主政時一一完成，

³¹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67，〈與張秀才棐第二書〉，頁 979。

³² 同前註，卷 34，〈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506。

³³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 55，〈奉酬永叔見贈〉，頁 449。

³⁴ 同前註，卷 73，〈孟子〉、〈韓子〉，頁 558-559。

³⁵ 徐洪興，〈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孔孟月刊》32 卷 3 期（1993.11），頁 14。並參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卷 10，「《石經孟子》十四卷」條，頁 169。

孟子配享乃是官方建構孟子地位的最高潮³⁶，推究其原因，王安石功不可沒。³⁷從文化而及政治，從諸儒提倡到廟堂尊崇，原本強調文化傳承的《孟子》，轉化為儒者政治革新的精神指標，孟子地位的確定與儒者思索參與政治態度有密切的關聯，從慶曆到熙寧，北宋諸儒推動政治革新，一改以往由韓而及孟的思考路徑，「新黨」變法，歷史評價不高，然而王安石以「師臣」身分大展治國方略，³⁸企圖將理想化為現實，孟子顯然具有指導變革的力量。³⁹從表彰韓愈，改為尊崇孟子，對新黨印象不佳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⁴⁰，尊孟已然於北宋諸儒政治實踐當中，確立地位。從聖賢相輔，羽翼儒學的五賢信仰，逐漸由孟子獨膺傳道重任，如何繼承絕學，成為儒學新議題。以往檢視朱熹〈孟子序說〉，無法了解其中統緒，以《史記》介紹孟子生平，形

³⁶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05，〈禮〉載「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詔如禮部議。」頁 2549。孟子地位高於荀子、揚雄、韓愈，配享孔廟，雖出於陸長愈之議，但以禮部力陳主張，廓清疑慮，朝廷風向於此可知。北宋從祀，請參閱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4），頁 253-256。

³⁷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124。

³⁸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 233 載熙寧五年五月甲午神宗挽留王安石辭相位云：「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又民相與盡其道以又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頁 15。所謂「道德之說」，視臣為師，可以說是韓愈所揭示儒學自覺的最終表現，神宗並非懵懂闇弱之君，充分授權，固然是王安石激昂出神宗革新的熱忱，但從思想脈絡檢視，更是北宋諸儒以來發揚儒者精神的結果。

³⁹ 參見陳逢源，〈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42-45。

⁴⁰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 90，「禮七」，頁 2294。

式同於〈論語序說〉，後文以四則韓愈言論證成孟子地位，所謂「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苟與揚，大醇而小疵」、「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⁴¹由韓而及孟，朱熹採用韓愈意見以尊孟，卻又略去韓愈承繼地位，由此及彼，去取之間，安排頗為奇怪。但考察北宋諸儒題稱聖賢系譜的情形，可以了解此乃逐漸形成的意見，〈孟子序說〉保留此一歷史發展軌跡，北宋儒學運動正是朱熹思考的起點，朱熹〈孟子序說〉以程子說法云：「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⁴²疑似之間，朱熹以二程作為立論基礎，說法或許缺乏證據支持，但流傳既久，影響深遠，諸儒之間，早已建立「話語」的力量，甚至成為諸儒思考的依據。

三、由事功入於心性

王安石得君行道，外王事業，終於有實現的機會，千載良機，最終卻未能實現平治天下的理想，反而造成人心離散，家國崩潰，悖反發展，既是北宋最重要政治事件，也是儒學復興必須釐清的問題。檢覈新黨人物的著作情形，王安石撰有《孟子解》十四卷，其子王雱（1044-1076）有《孟子解》十四卷，連襟王令（1032-1059）有《孟子講義》五卷，門人龔原（約1043-1110）有《孟子解》十卷，許允成有《孟子新義》十四卷，對於《孟子》的關注，於此可見，⁴³然而關乎心性討論，王安石本身立場卻有些游移，〈性論〉云：

⁴¹ 宋·朱熹，〈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8。

⁴² 同前註。

⁴³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卷233，頁4-7；卷234，頁1。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論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中庸》而明於七篇。……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⁴⁴

王安石以性論作為孔子、子思（前483-前402）、孟子相互銜接的線索，孟子得勝出，乃是性論與孔子同調，至於荀子、揚雄、韓愈觀念不清，自然無法與列於賢人系譜當中，王氏已從羽翼儒學的角度，進入孔門之傳的思考，⁴⁵文集中尚有〈原性〉、〈性情〉、〈性說〉、〈性命論〉、〈揚孟〉等諸篇文字，分析心性，已是王安石學術重點，只是〈原性〉一篇云：「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⁴⁶甚至指出「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⁴⁷，對於先驗善性體會不深，王安石援取孟子精神，卻於關鍵之處偏差，毫釐之失，謬以千里，變法失其根本，新學成為後儒必須深加反省的問題。孔孟如何傳承，成為進一步關注的焦點，筆者檢覈《全宋文》，考察當時諸儒意見，蘇軾有〈子思論〉、〈孟子論〉、〈荀卿論〉、〈揚雄論〉、〈韓愈論〉諸文，提出「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甚至撰有〈韓愈優於揚雄〉一文⁴⁸，尚屬於五賢信仰

⁴⁴ 宋·王安石，〈性論〉，《臨川先生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冊 65，卷 1406，頁 21。

⁴⁵ 按：孔子、孟子間傳承線索，韓愈已有論及，韓愈撰〈送王秀才序〉云：「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4，頁 153。

⁴⁶ 宋·王安石，〈性論〉，《臨川先生文集》，收入《全宋文》冊 64，卷 1404，頁 361。

⁴⁷ 同前註，頁 301。

⁴⁸ 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90，卷 1948，〈子思論〉、〈孟子論〉、卷 1949，〈荀卿論〉、〈揚雄論〉、〈韓愈論〉，頁 60-79。所引文字出於〈揚雄論〉，頁 75。卷 1966，〈韓

的討論，至於〈跋荆溪外集〉云：「顏淵死，弟子無可與微言者。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惟曾子信道篤學不仕，從孔子最久。」〈策略四〉云：「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⁴⁹用意在於貫串孔子、孟子之間的傳承線索，但重點並非性論，相同思考也見於蘇轍（1039-1112），云：「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⁵⁰朱光庭（1037-1094）〈乞定子思封爵奏（貼黃）〉云：「子思則傳聖人之道，見於世者也，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荀、韓、揚固未及其堂奧。」⁵¹孫傳（?-1128）〈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云：

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為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著書立言，上以告其言，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⁵²

王銍〈岷縣修學碑〉云：

孔子沒而學進者曾子也，一以貫之，許之以道矣。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所謂忠恕，所謂誠明，所謂養氣，一也。……⁵³

傳承內容頗為分歧，但推究更深一層，思考更進一步，孔子、孟子之間的儒學之傳，已經成為諸儒共同思考的議題，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道脈絡，逐漸取代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說法，形成一種新的題稱方式。陳淵（?-1145）〈論心過笥子〉云：

愈優於揚雄並引狀問〉，頁 365。

⁴⁹ 宋·蘇軾，《蘇文忠公全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89，卷 1933，〈跋荆溪外集〉，頁 210。冊 90，卷 1957，〈策略四〉，頁 201。

⁵⁰ 宋·蘇轍，〈論語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欒城第三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96，卷 2084，頁 41。

⁵¹ 宋·朱光庭，〈乞定子思封爵奏〉，《續資治通鑑長編》，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92，卷 2012，頁 396。

⁵² 宋·孫傳，〈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山左金石志》，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154，卷 3319，頁 273。

⁵³ 宋·王銍，〈岷縣修學碑〉，《刻錄》，卷 1，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182，卷 3992，頁 186。

是之為說，見於《論語》之所謂仁，子思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性，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以心傳心，後之王者不可不知也。⁵⁴

員興宗〈諸子言性論〉云：

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彝倫攸敘，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貫于一，顏子得之以履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也。⁵⁵

北宋、南宋政局變動，刺激更多的反省，諸儒以性論建構聖賢相傳的線索，道統系譜取代五賢信仰已經成趨勢，標舉「心傳」與「精一」之論，對於朱熹思考，饒有啟發作用。至於進一步反省「新學」，從心性分析中，思考義理必須跨越之處，確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聖人傳道內容，則是有待二程的反省與思考，檢覈二程言論，云：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眾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⁵⁶

變法原是北宋儒者的共同想望，只是王安石從「人主心術」下功夫，以「利」誘之的結果，最終風氣大壞，「新政」之弊，並非政策事務的失敗而已，更令人憂心的是人心墮落，風氣糜爛，學者必須分判義利，重新思索儒學核心價值，導人君於修德之途，尋回儒學主軸，二程顯然認

⁵⁴ 宋·陳淵，〈論心過笥子〉，《默堂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153，卷 3292，頁 141。

⁵⁵ 宋·員興宗，〈諸子言性論〉，《九華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18，卷 4845，頁 263。

⁵⁶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卷 3，「遺書」，頁 58。

為「性善」乃對治良方。《二程全書》隨處可見有關心性的檢討，就以後人熟知之〈定性書〉（〈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云：「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⁵⁷，「性」為心中體證工夫⁵⁸，其中意義，必須置於北宋以來儒學自覺思潮中考察，也必須配合王安石「新學」一同思考。楊時（1044-1130）訂定，張栻（1133-1180）編次的二程《粹言》，其中〈聖賢篇〉、〈君臣篇〉、〈心性篇〉三篇相續，「聖賢」、「君臣」、「心性」彼此相關，正是反映二程思考內容，〈君臣篇〉載一段君臣事例，云：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當為卿戒之。」因論人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明道之未為臺諫也，察荊公已信用矣。明道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闊，而禮貌不少替也。一日極論治道，上斂容謝曰：「此堯、舜之事也，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荊公畫策寢行，……興利之臣日進，而尚德之風寢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⁵⁹

「致君堯、舜之上」乃是儒者永恆的懷抱，然而國事螭蟻，於政局紛擾之際，力挽狂瀾，從功利回歸於心性，期許救贖人心陷溺，正是二程反省新學的結果。可見究析心性，並非違棄外王事業，而是反省功利想法之後，更深一層的經世思考，反映於聖人之傳，也就更具自信。甚至藉此鋪排有以繼之的線索，〈聖賢篇〉收錄程顥志康節之墓一段文字，頗為奇特，云：

⁵⁷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二程全書》，卷 56，頁 493。

⁵⁸ 牟宗三云：「明道此答書，朱子謂是『二十二三時作』（見《語類》卷第九十三），此恐未必。近人似有考其為二十七八時作，此或較可信。……總之，明道成熟相當早，此書總是成熟之作。」見《心體與性體》（二）（臺北：正中書局，1968），頁 238。

⁵⁹ 宋·楊時訂定，張栻編次，《二先生粹言》，收入《二程全書》，卷 41，頁 376-377。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才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⁶⁰

二程列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作為儒學傳道系譜，在孔門當中，確立主軸，北宋諸儒昂然挺立，遙契聖賢的歷史情懷中，終於獲致生命永恆的依歸，明道以此做為表彰邵雍的用語，孔、曾、思、孟，聖賢相傳，漸進發展，從尊孔詞彙，又有進一步的發展，聖賢不是遠古想像的用語，而是儒者追求實踐的目標。不過其中還有必須釐清之處，朱熹〈孟子序說〉引述程子之言，云：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⁶¹

二程認為孟子「性善」、「養氣」皆是有功於後世之論，但分別孔子、孟子差異的興趣，顯然大於建構孔、孟傳承思考，承認孟子價值，卻又覺得與孔子尚有距離。此一細節，有待朱熹補足，云：「至字，恐當作聖字」，孟子為聖人，反映朱熹承繼二程的進程處⁶²，《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朱注云：

⁶⁰ 宋·楊時訂定，張栻編次，《二先生粹言》，頁 369。

⁶¹ 宋·朱熹，〈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 199。

⁶²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冊 3，「朱子評程氏門人」云：「朱子自幼即生長於伊洛傳統之氛圍中，其早年為學，主要途徑，乃為自程門諸子上窺二程，又自二程《語錄》進究《論》、《孟》、《學》、《庸》四書。就其《文集》及著述先後言，此實斷無可疑者。而朱子學問與年俱進，乃能由二程而識破程門諸子之病失所在，復能由《論》、《孟》、《學》、《庸》四書而矯糾二程所言之亦有疏誤。」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⁶³

「天理」與「人欲」之辨，乃是《孟子》關鍵之處，朱熹有意使政治議題，轉為道德論述，「人心」為成就之關鍵。朱熹對於《孟子》「性善」的肯定，較之前儒更為精準，也更具信心，此於〈孟子序說〉朱熹引韓愈「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說法下引程子之言：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⁶⁴

唯有了解性善乃儒學核心價值，孟子才能從荀子、揚雄、韓愈諸賢系列中脫穎而出，也唯有了解性善內涵，也才能對治新政趨利的偏失，救贖人心的墮落。《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世子」章，朱注云：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是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⁶⁵

朱熹推究精微，於此可見，朱熹〈孟子序說〉引楊時之言：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釋回增美，以之發揚二程之傳統，誠朱子在當時學術界一大動績也。」頁217。「釋回增美」乃是對於朱熹承繼二程最佳的描述，參見陳逢源，〈錢賓四先生超越門戶視野之四書詮釋——以朱子新學案為研究範圍〉，《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頁327-352。

⁶³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2。

⁶⁴ 宋·朱熹，〈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8。

⁶⁵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4，〈滕文公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52。

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⁶⁶

事功從心性工夫得之，君心正則國定，所謂「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用計」、「用數」所得之功業，其實是人心陷溺的結果，學者必須要有看破眼前利益的識見，堅持儒學基本立場，才能成就平治天下的事業。⁶⁷性善既是儒學思想核心，歐陽脩雖為北宋大儒，撰有〈正統論序〉、〈正統論上〉、〈正統論下〉⁶⁸，蘇軾有〈正統論〉三首⁶⁹，關注歷史正統問題⁷⁰，探究「理」與「勢」的問題⁷¹，視野不可謂不大，但觀點既偏，無法得見《孟子》真正價值，也就無法與於道統之列。朱熹綜納前賢意見，〈孟子序說〉將楊時說法列之於末，自有作結之意，回歸「性善」主軸，孟子地位於茲確立，儒學內涵再無疑義。

⁶⁶ 宋·朱熹，〈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9-200。

⁶⁷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遺書》，卷3，頁58。

⁶⁸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卷16，〈正統論序〉、〈正統論上〉、〈正統論下〉，頁265-273。〈正統論下〉云：「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成為檢視標準，其後所附〈或問〉也是有關歷史正統的討論。至於後文所附〈原正統論〉、〈明正統論〉、〈秦論〉、〈魏論〉、〈東晉論〉、〈後魏論〉、〈梁論〉等七篇，則是保留原稿模樣，頁275-286。

⁶⁹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正統論三首〉，頁120-126。

⁷⁰ 宋·陳師道，〈正統論〉，《後山居士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123，卷2667，頁335。

⁷¹ 劉治立，〈「事」、「理」與「勢」、「理」探討的深入〉，《學習與探索》2008年4期，頁212-214。。

四、重構儒學核心

五賢信仰來自於尊孔訴求，如何從歷史傳續，進而及於孔門心法的追尋，在政治實踐當中，獲致儒學核心價值，必須於經典當中尋求答案，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屢屢可見其思考。《大學章句》篇首引程子之言「《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⁷²於第一章言「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⁷³經一傳十架構，後人未必皆能接受，卻是深有道統之傳的巧思。相同之處，《中庸章句》篇首言「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⁷⁴於第一章言「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⁷⁵第十二章言「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⁷⁶第二十章言「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⁷⁷第二十一章言「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⁷⁸朱熹並非交代版本、言其出處而已，用意所在，乃是於經文中發掘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線索，提供聖門心法的證明。朱熹由孔子而及曾子，由子思而及孟子，鋪排傳道的意象，因此對於孔子有傳，

⁷² 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3。

⁷³ 同前註，頁4。

⁷⁴ 宋·朱熹，《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17。

⁷⁵ 同前註，頁18。

⁷⁶ 同前註，頁23。

⁷⁷ 同前註，頁32。

⁷⁸ 同前註。

以及如何傳述孔子，反復致意焉。後人未能掌握思想發展內在理路，了解宋儒由五賢信仰進而及於道統系譜的發展，以及從儒學有傳到儒門傳道的思考，也就無法了解朱熹建構巧思，以及蓄積已久的發展。舉例言之，朱熹〈論語序說〉引錄《史記·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下注云：「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⁷⁹於「字子思，作《中庸》」下注云：「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⁸⁰〈孟子序說〉引《史記·孟子列傳》生平資料，於「受業子思門人」下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於「道既通」下注云：「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⁸¹「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⁸²又於引韓愈之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下注云：「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⁸³朱熹藉由韓愈與程子之言，相互證成⁸⁴，特殊的引錄方式，從前賢說法中，得見孔門傳道的系譜。

⁷⁹ 宋·朱熹，〈論語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 42。

⁸⁰ 同前註，頁 43。

⁸¹ 宋·朱熹，〈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 197。

⁸² 同前註，頁 197。

⁸³ 同前註。

⁸⁴ 參見陳逢源，〈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327-328。

有此了解，觀察《四書章句集注》詮釋內容，《論語·學而篇》「吾日三省吾身」章，引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乎！」⁸⁵發掘曾子嘉言善行，成為朱熹注解的重要工作。⁸⁶《論語·里仁篇》「吾道一以貫之」章，朱注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⁸⁷朱熹於此標舉「理一分殊」的道理，彰顯孔子與曾子的默契，引錄程子之言云：

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⁸⁸

孔子傳道樣態，曾子理解情形，以及《論語》與《中庸》義理貫串的提醒，全然展現。甚至對於師生之間，朱熹也頗為留意，嘗試分析其中細節，《論語·述而篇》「子溫而厲」章，朱注云：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也，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⁸⁹

內容固然出於推測，然而曾子「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的意義，朱熹提醒要反復玩味，深思意義，乃是宋儒於孔門弟子當中篩選後的結

⁸⁵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1，〈學而篇〉，《四書章句集注》，頁48-49。

⁸⁶ 參見陳逢源，〈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文與哲》第八期（2006.6），頁300-309。

⁸⁷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2，〈里仁篇〉，《四書章句集注》，頁72。

⁸⁸ 同前註，頁73。

⁸⁹ 同前註，卷4，〈述而篇〉，頁102。

果，其他相關描述頗多，如《論語·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引尹氏云：「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⁹⁰子貢聰穎，然而終不及曾子，《論語·先進篇》「參也魯」章引程子言「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⁹¹以「誠篤」來解釋「魯」，無疑是極為特殊的詮釋，然而對於曾子的偏愛，正是詮釋當中必須留意之處，甚至對於歷來熟悉的孔門「四科十哲」說法，朱熹也引程子之言加以駁斥，云：

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⁹²

孔子教誨弟子，原本就是期以有所得而告之，對於弟子應無分別，然而宋儒卻以「將有所得」、「能達此」來強化曾子得傳孔子學術的印象，至於曾子回答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節，成為曾子傳孔子學術的證明，甚至在《孟子·公孫丑上》「曾子之守約」章揭示曾子「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的說明，⁹³儒學多門，但從經典當中，孔子傳道的內容，由曾子而及於孟子，已有修養工夫相承的線索，儒學精神所在，終於有確定的方向。又如《孟子·滕文公上》「江漢以濯之」章，朱注云：「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⁹⁴曾子稱揚孔子，孟子褒揚曾子，於注解當中，朱熹以備列一說的方式，串聯孔子、曾子與孟子的關聯。朱熹留意孔子與孟子的承繼線索，反映於注解當中，朱注《孟子·萬章上》「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章，引尹焞之言：

⁹⁰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8，〈衛靈公篇〉，《四書章句集注》，頁 161-162。

⁹¹ 同前註，卷 6，〈先進篇〉，《四書章句集注》，頁 127。

⁹² 同前註，頁 123。

⁹³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 3，〈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30。

⁹⁴ 同前註，卷 5，〈滕文公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61。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⁹⁵

又如《孟子·離婁下》「仲尼不為已甚者」章，朱注引楊時之言：

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⁹⁶

孟子表彰孔子不遺餘力，承繼孔子職志，至為明顯，只是孔、孟之間，是悖反還是繼承，唯有對於儒學內涵的真正掌握，得見孟子承繼線索，對於李觀「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⁹⁷的說法，也才有真切的批判與反駁。朱熹為求彰顯孟子傳道意涵，甚至結合《孟子·離婁下》「舜明於庶物」、「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王者之迹熄」、「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諸章，從聖人相繼中，孟子得出慨然承擔的歷史情懷⁹⁸，「自任之重」、「不得而辭」指出君子無可逃於天地的使命，儒者不是為當世帝王服務，而是要有聖賢相承，身膺其任的道德自覺，所以孟子上承於孔子，更溯及舜、禹、周公相繼的精神，儒者表彰聖人系譜用意所在也就清楚明白。朱熹於《孟子·離婁上》「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注云：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裡，學者宜潛心焉。⁹⁹

本章亦見於《中庸》第十九章¹⁰⁰，《大學》、《中庸》、《孟子》義理相通，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彼此相承，所謂「學者宜潛心」，於此

⁹⁵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9，〈萬章上〉，《四書章句集注》，頁309。

⁹⁶ 同前註，卷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91。

⁹⁷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12所錄《常語》，頁92。以及余允文撰，《尊孟辨》卷中，頁529。

⁹⁸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95。

⁹⁹ 同前註，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82。

¹⁰⁰ 宋·朱熹，《中庸章句》，頁31。

暗示孔、孟傳承線索，著力既深，為求符應，朱熹甚至於《孟子》最後〈盡心下〉最末一節巧為布局，云：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¹⁰¹

揭示孟子志繼其傳的訴求，聖聖相繼，提供「俟後聖於無窮」的無限期許，「天理民彝」無疑是天人合德最佳的說明，百世之下，終有心領神會，獲得真解之人，道統終將顯豁，相同的安排，也見於《論語》最後〈堯曰〉一篇，朱熹引楊時之言：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¹⁰²

朱熹對於《論語》、《孟子》篇末以聖人系譜作結，暗示歷敘堯、舜、湯、文、相承脈絡，彰顯慨然承擔的情懷，乃是孔門家法，朱熹細心梳理，遂能回應北宋以來從五賢信仰到聖門傳道的思考，道統論述巧妙織入經典詮釋當中，朱熹遂於〈大學章句序〉云：「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¹⁰³提出深切的呼籲，並且於〈中庸章句序〉揭示聖聖相傳的「道統」線索，云：

¹⁰¹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 14，〈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377。

¹⁰²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 10，〈堯曰〉，《四書章句集注》，頁 194。

¹⁰³ 宋·朱熹，〈大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 1-2。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¹⁰⁴

堯、舜、禹、湯、文、武聖人相承結構中，續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傳道系譜，彰顯儒者遙契堯、舜，志繼孔孟的情懷，此一路徑，極具創意，也深有召喚效果，不僅確立北宋以來儒學主軸，也終於形塑四書經典地位，自此「朱熹」、「四書」、「道統」成為一體之概念，當然日後不同思維，對於朱熹分列經傳方式，以及偽古文《尚書》辨偽工作，乃是清人學術用力所在，牽涉既廣，非本文所能處理，茲不贅述。

五、結論

近人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從「學術社群」角度出發，得見南宋多樣的思潮中朱熹的複雜交流樣態¹⁰⁵；余英時先生從士大夫的身分屬性，建構朱熹社會與政治的關懷¹⁰⁶，一改以往理學形上學的分析方式，將朱熹置於時代當中，了解思想史的一種「共相」發展。¹⁰⁷朱熹從

¹⁰⁴ 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14-15。

¹⁰⁵ 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惟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8）。

¹⁰⁶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頁42-44。

¹⁰⁷ 當然此一方式與以往關注「性」、「理」、「氣」的方式不同，道學被放在政治史背景下討論，揭示一個貫穿性的背景，視野改變，遂有不同以往

聖賢想望當中，重塑儒學的核心價值，既承之於前，又醞釀於己，饒富融鑄進程之思考，在歷史時空中，隱藏一種賡續的脈絡，每一句話語既承之於前人，也啟發後人思考¹⁰⁸。北宋諸儒共同參與了儒學自覺與反省，從堯、舜、禹、湯、周公、孔子到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再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既參與其中，又饒有建構，聖人系譜轉化為孔門心法，從而證成四書價值，撮舉觀察，有如下之心得：

- 一、孟子以堯、舜、禹、湯聖聖相承的歷史系譜，申明個人懷抱，聖化史觀，成為韓愈援引材料，不僅極具時代意義，也召喚後人有以繼起的情懷，從聖君相繼，開展出孔子地位的討論，儒學傳承問題成為諸儒檢討的議題。
- 二、尋求儒者相傳線索，蘊釀已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為孔學之淵源，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為孔學之羽翼，以賢輔聖，聖賢相繼，孔子地位得以不墜，儒學得以傳承，來自於歷史上諸儒共同努力的結果。
- 三、北宋諸儒從表彰韓愈，改為尊崇孟子，新黨之後，尊孟立場已然於北宋諸儒之政治實踐當中，確立地位，聖賢相傳，羽翼儒學的五賢信仰，逐漸由孟子獨膺傳道重任，風氣改易，王安石居功厥偉。
- 四、然而對於孟子義理的掌握，確認《孟子》「性善」論的價值，使政治議題，回歸於道德論述，則有待二程的努力，回歸於人性，確認性善為儒學核心價值，儒門多歧，然而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脈

的心得。參見葛兆光，〈拆了門檻便無內無外：在政治、思想與社會史之間——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相關評論〉，《書城》（2004.1），頁 43-49。

¹⁰⁸ 錢翰云：「巴赫金的對話性來自對話（dialogue），是口頭語言，其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蘊涵著強烈的人本主義色彩。而克里斯特瓦處在法國結構主義思潮中，人本主義受到強烈質疑和批判。互文性的詞根是文本（texte），是書面語言。」參見〈從「對話性」到「互文性」〉，周啟超主編，《跨文化的文學理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頁 82。書面語言與對話的差異，正如同文章與語錄有別，本文整理諸儒文集，重新檢視一種互文性的書寫傳統，在北宋諸儒稱引聖賢系譜的現象中，正可以說明理學其實是在儒學自覺運動中產生的結果。

絡清楚，從遙契古聖先賢的歷史情懷中，對於孔子之傳，宋儒已有定見。

五、朱熹承繼北宋以來儒者思索的成果，方向既定，孔門之傳遂有真切的體會，孔、孟具有儒學核心地位，曾子、子思成為聯結人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間的道統，必須於孔門當中尋其脈絡，朱熹以經典印證義理，以義理形塑經典，巧妙安排，四書遂有道統之義理體系。

致君於堯、舜，乃是儒者之志，從功利回歸於心性，期許救贖人心陷溺，正是宋代儒者反省新學的結果，朱熹融鑄前賢議論，回歸於聖門傳道思考，儒學情懷得以顯豁，聖人精神得以朗現，《四書章句集注》遂有深刻之義理內涵，「道統」既出歷代的積累，也是朱熹建構的成果。筆者歷檢北宋諸儒題稱聖賢的方式，得見「道統」論述脈絡，雖然翻檢頗鉅，但一窺朱熹匯聚前論的思考，關注宏大於此可見，只是另闢蹊徑之觀察，不同以往的分析方式，難免陷於偏弊而不自知，尚祈前輩學者有以諒之，有以教之。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 〔唐〕韓愈撰，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
- 〔唐〕皮日休，《文藪》，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1。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 〔宋〕柳開，《河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5。
- 〔宋〕孫復，《孫明復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0。
- 〔宋〕石介，《徂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0。
-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1089。
-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 〔宋〕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_____，《蘇文忠公全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蘇轍，《欒城第三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朱光庭，〈乞定子思封爵奏〉，〔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王柏，《魯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
- 〔宋〕孫傅，《山左金石志》，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王銍，《劄錄》，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陳淵，《默堂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宋〕員興宗，《九華集》，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
-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陳鎬纂修，《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
- 〔清〕黃宗羲，〔清〕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臺北：文友書店，1972。
- 〔清〕戴震撰，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清〕趙翼，《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60。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 _____，《心體與性體》（二），臺北：正中書局，1968。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
- _____，《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 周予同，《群經概論》，高雄：復文書局，1986。
- 周啟超主編，《跨文化的文學理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
- 陳逢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錢穆，《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 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惟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8。

（二）單篇論文

- 徐洪興，〈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孔孟月刊》32卷3期（1993.11），頁36-44。
- 陳逢源，〈朱熹論孔門弟子——以四書章句集注徵引為範圍〉，《文與哲》第八期（2006.6），頁279-310。
- 葛兆光，〈道統、系譜與歷史——關於中國思想脈絡的來源與確立〉，《文史哲》2006年第3期（總294期），頁48-60。
- _____，〈拆了門檻便無內無外：在政治、思想與社會史之間——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相關評論〉，《書城》（2004.1），頁43-49。
- 劉治立，〈「事」、「理」與「勢」、「理」探討的深入〉，《學習與探索》2008年4期，頁212-214。

(三) 會議論文

陳逢源，〈錢賓四先生超越門戶視野之四書詮釋——以朱子新學案為研究範圍〉，《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頁327-352。

Selected Bibliography

- Zhu, Xi. Sishu Zhangju Jizhu. Taipei: Chang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Huang, Zong-Xi zhuan Quan, Zu-Wang buxiu. Songyuan Xuean. Taipei: Huashi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Mou, Zong-San. Xinti yu Xingt I . Taipei: Taiwan Stude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 Mou, Zong-San. Xinti yu Xingt II . Taipei: Zhengzhong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 Yu, Ying-Shi. Zhuxi de Lishi Shijie : Songdai Shidafu Zhengzhi Wenhua de Yanjiu. Taipei: Yunchen Wenhua Company, 2003
- Zhou, Yu-Tong. Qunjing Gailun. Kaohsiung: Fuwen Book Company, 1986
- Chen, Feng-Yuan. Zhuxi yu Sishu Zhangju Jizhu. Taipei: Liren Book Company, 1986
- Huang, Jun-Jie. Zhongguo Mengxue Quanshi shilu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ompany, 2004
- Qian, Mu. Xhuzi Xinxuean,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Hoyt Cleveland Tillman. Zhuxi de Siwei Shijie. Taipei: Yunchen Wenhua Company, 2008

**From Five Intellectuals' Faith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Sages' Mind
—Zhu Xi's Re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Sishu zhangju jizhu)***

Feng-Yuan Chen*

Abstract

Mencius has 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pedigree of sages, from Yao, Shun, Yu, to Tang, in order to express his own aspiration. The sainted historical viewpoint then became the reference of later generations. Being as virtuous as Yao or Shun was a calling to many gentlemen. Therefore, they took mind much more seriously than utility in order to save depraved heart. The work is definitely the result of their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sages. Yao, Shun, Yu, Tang, Wen, Wu, and the Duke of Zhou were all the enlighteners of Confucius, while Mencius, Xunzi, Yang Xiong, Wang Tong, and Han Yu were the followers of Confuciu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there were two pedigrees of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First, Mencius was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ood and then passed on Confucius' study to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Second, the pedigree was a continuous line, which is from Confucius, Zengzi, Zisi, and then to Mencius. Zhu Xi combined all intellectuals' comments and recovered all sages' thoughts of preaching, which included the arrangement of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 of details, and coherent context. On the basis of Zhu's explora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re of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sages' mind. To be sure, *The Exegesi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exts from the Four Books* is full of perspicacious doctrine. The change of pedigree of sages in the *Song* Dynasty indicates that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was not only accumulated by many dynasties, but also the fruit of Zhu's construction.

Keywords: *Song* School, Zhu Xi, *Four Books*,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Pedigree of Sages.